

《辨奸论》与林彪的政变经

《辨奸论》与林彪的政变经

北京人民出版社

《辨奸论》与林彪的政变经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3,000字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书号: 11071·26 定价: 0.10元

目 录

《辨奸论》与林彪的政变经	
.....	施 平(1)
尊儒反法的《辨奸论》	
.....	廖钟闻(11)
《辨奸论》译注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译注(23)

《辨奸论》与林彪的政变经

施 平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然而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关于政变的讲话中，却从《古文观止》里把《辨奸论》搬了出来，这是有其险恶用心的。《辨奸论》究竟是一篇什么东西？林彪为什么那么欣赏它？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一

《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1057—1134）假冒苏洵（1009—1066）的名字写的一篇不到五百字的文章，首见于《邵氏闻见录》。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到王安石的名字，但其攻击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安石和他所进行的变法的。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52页注二）他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开始变法。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缓和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矛盾和巩固封

建中央集权。这次变法限制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增强了北宋王朝抵御辽和西夏统治者侵扰内地的能力，是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物，他继承了法家宣扬革新、反对复古的传统。特别值得称颂的是他针对孔丘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针对宋王朝统治集团的“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王临川全集》卷三九，《上时政疏》），提出了“三不足”的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思想，表现了王安石作为唯物主义者和改革家不信天命、不循先王旧法、不怕谣言诽谤的反潮流精神。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变法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与破坏。司马光一伙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孔老二把春秋末年的形势说成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司马光一伙也学着孔老二的腔调，把变法以后的形势说成是“四海危骇，百姓骚然”，“中外鼎沸”；孔老二要维护“周公之典”，司马光之流也竭力维护“祖宗旧法”，把王安石变法看成大逆不道；他们还把王安石骂作少正卯，骂作商鞅，以发泄他们对变法的刻骨仇恨，这一切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

顽固派还根据孔老二的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用散布流言、造谣中伤的手段来攻击王安石，破坏变法运动。有一个叫尤瑛的顽固派分子就说什么“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以元老重臣自居的文彦博则硬说推行“市易法”是导致“华岳山崩”的原因。熙宁七年大旱，

有个叫郑侠的顽固分子，也把天旱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顽固派用心之恶毒、手段之卑鄙，由此可见一斑了。

邵伯温和他父亲、道学家邵雍都是顽固派的成员，和顽固派头子司马光、富弼等人不仅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立场也是一致的。邵雍曾指使他的“门生故友”积极破坏变法。邵伯温在北宋徽宗时期竭力叫嚷“复祖宗制度”，到南宋初年又抛出了《辨奸论》。在这篇文章里他采取造谣中伤的手段，挥舞反动地主阶级人性论的破旗，攻击王安石“不近人情”，假冒苏洵之口疯狂咒骂王安石将要成为北宋王朝的大祸。

《辨奸论》是尊儒反法的典型。《辨奸论》一开头就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两句话是全文的纲。什么叫做“理”呢？北宋理学家说：“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五）。“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可见“理”就是指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这个封建统治秩序是“固然”的，就是说它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辨奸论》的主旨就在于维护这个封建统治秩序之“理”的永恒性，并用它作为衡量是非、评论人物的根据和标准。从这点出发，《辨奸论》把“孔老之言”、孔孟之徒以及《诗》、《书》之类视为正统，而把“与人异趣”，即敢于违反孔孟之道、敢于坚持革新路线、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王安石视为异端。其目的就是为了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政治路线，维护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统治秩序，贯彻大地主大官僚集团那条“复祖宗制度”的政治路线，把历史拉向后退。

林彪把《辨奸论》奉为经典，从中寻求反革命思想武器和

策略，是因为林彪也是尊儒反法、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辨奸论》大肆吹捧孔孟之道、孔孟之徒，把所谓“理”说成是万古不变的信条，把它作为知人论世的准则；林彪一伙也是这样，他们拜倒在孔老二、董仲舒脚下，叫嚷要象董仲舒那样用“孔孟之道”“统一人民的思想”，并鼓吹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准则，把这些东西冒充“历史唯物主义”。《辨奸论》攻击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王安石“不近人情”，是“大奸慝”；林彪也攻击法家是“罚家”，攻击商鞅、秦始皇，大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骂我们对敌斗争“做绝了”。《辨奸论》尊儒反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复古，反对革新。林彪尊儒反法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以贯彻他那一套“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同八百多年以前的反动小丑邵伯温在开历史倒车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的。林彪把《辨奸论》奉为经典，正是出于他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二

林彪把《辨奸论》奉为经典，不仅因为他与邵伯温政治路线的反动实质是一致的，而且还因为他与邵伯温在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林彪正是把《辨奸论》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

《辨奸论》是一篇贩卖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文章。它说：“唯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所谓“静者”就是那种“好恶”

不“乱其中”，“利害”不“夺其外”，超然于客观世界之上、与神相通的“超人”，只有这种人才了解“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才能了解“天地阴阳之事”。可见这个“静者”就是孔老二所说的“生而知之”的“上智”、孟轲所说的“先知先觉”。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道学家炮制这么一个“静者”，无非是为了论证他们是“天理”的化身，论证大地主集团的统治秩序是天然合理的。

邵伯温说：“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可见这种所谓“见微而知著”纯粹是脱离实践的内心的顿悟。毛主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人们只有接触外界事物，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认识事物，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掌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逐步达到对于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辨奸论》中的“见微而知著”完全排除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所以，它只是一派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胡说而已。

邵伯温在《辨奸论》中是怎样“见微而知著”的呢？他捏造了一些关于王安石的生活细节，说他穿的是囚犯衣，吃的是猪狗食，蓬首垢面，还在读什么《诗》《书》，这实在是“不近人情”，这算是“微”；然后说他将要成为“大奸慝”，将成为北宋王朝的大患，这算是“著”。这纯粹是一种捕风捉影的主观臆断。在邵伯温所谓的“微”和“著”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他却硬要把它们生拉在一起，毫无根据地作出“见微知著”的推断。这正如恩格斯在斥责旧的历史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其实，所谓“静者”，所谓“见微而知著”，都不是邵伯温的发明创造。《易·系辞》中就说过，不接触实践的“君子”可以“知微知彰”。《中庸》里也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意思就是说，清心寡欲、具有先验知识的人，可以预知一切。他可以从一些天意的“征兆”里，判断出国家的兴亡盛衰。东汉《白虎通义》更进一步说：“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而知著也。”意思就是说，那种高居人群之上的“智者”是无所不晓的，他们能未卜先知，不为事物的千变万化所迷惑，能“见微而知著”。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见微而知著”并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预见，而是神秘主义的呓语。

南宋初年的跳梁小丑邵伯温和今世的政治骗子林彪，虽然生活在两个时代，然而他们在反动的世界观上，却一脉相承，息息相通。林彪搬出《辨奸论》，一眼就看中了“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的鬼话，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在那篇关于政变的讲话中，只引用了《辨奸论》中的“见微而知著”这后半句话，却把上半句“惟天下之静者”略去不提，这决不是什么疏忽大意，而是由于他生怕暴露出自封“天才”的狼子野心，这是他作贼心虚的表现。然而，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就在这篇讲话中，他大骂别人都是“马大哈”、“糊涂虫”，似乎只有他才是“前知百世，后知千岁”的“静者”。他大叫什么“天才”要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实际上是把自己装扮成“天才”人物。不仅如此，他们那一伙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以“天马”自比，以“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今时之“古贤”自居，这样，他们不仅在思想

上与邵伯温完全一致，而且在语言上也完全袭用了道学家的陈词滥调。林彪一伙如此卖力地鼓吹“天才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为了“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林彪一伙把反动的“天才论”奉为反党的理论纲领，正是为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

邵伯温在《辨奸论》里大讲“见微而知著”，是为了搞所谓的“辨奸”，攻击王安石；林彪摇唇鼓舌地大谈“见微而知著”，也是为了以“辨奸”为名，行反革命政变之实。他在那个黑讲话中，危言耸听地叫嚷“野心家大有人在”，“不少的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他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过程中，更是无中生有地造出一堆又一堆的政治谣言，阴谋分裂我们的党。其实，这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贼喊捉贼，借以掩盖他搞阴谋、搞政变的一种鬼蜮手段，是为他抢班夺权准备条件。

三

《辨奸论》通篇贯穿着“国以一人兴，国以一人亡”的唯心史观。它认为西晋王朝的覆亡是由于出了个“欺世盗名”的王衍；唐德宗时的政治混乱是由于出了个心地险狠的卢杞；而北宋王朝的灭亡，则是由王安石这个“大奸慝”一手造成的。其实，北宋的灭亡完全是大地主集团顽固推行其守旧路线的结果。邵伯温散布这种个人决定王朝兴衰的唯心史观，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王安石变法革新路线的攻击，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推脱责任，同时也为当时南宋主和派的

苟且偷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张目。

林彪也是一个唯心史观的狂热鼓吹者。他把《辨奸论》奉为经典，贩卖唯心史观。他列举了古今中外政变二十多例，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成剥削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宫廷政变史，把政变硬说成是历史的“本质问题”。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历史的本质。而林彪大谈“政变经”，把政变说成是历史的本质，这就表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耻叛徒。

叛徒林彪在那个黑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歪曲世界形势和历史事实，他只字不提世界形势的根本特点是“天下大乱”，只字不提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却胡说什么“世界政变成风”。林彪蓄意要把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说成世界的主宰，这不是十分明显吗？马克思在研究拿破仑第三 1851 年政变时指出：“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599 页）只有把政变置于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对政变有正确的了解。林彪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在谈论政变时，却居心叵测地抽去了政变的阶级基础，把政变当作是纯粹的“个人的暴力行为”。例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但

很快就被风起云涌的人民群众的反袁斗争推翻了。这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而林彪却偏要把它讲成是袁世凯个人活动的表现。林彪还把蒋介石1927年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也说成是蒋介石一个人活动的结果。林彪这样肆意地歪曲历史，就是要把这些反动小丑装扮成可以任意左右人类历史的人物，把他们一伙阴谋发动的政变讲成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情。

在那个黑讲话中，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不讲阶级斗争，大肆贩卖唯心史观。他这样做，其罪恶用心就在于，一方面是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理论根据，为他的反革命死党壮胆助威，要他们充分发挥那个“很大”的“政治上的能量”，与人民为敌到底。另一方面就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篡改我党的理论基础，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要我们放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根本上解除革命人民思想上的武装，以便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辨奸论》这篇尊儒反法、造谣中伤的卑劣文章，通篇渗透着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辨奸论》是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标本。反革命分子林彪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来了这篇破烂货，如获至宝，推崇备至，作为他阴谋政变的理论根据，这就充分证明了他和宋代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人物一样，都是开历史倒车的顽固党徒。但是，历史车轮是从来不会按照顽固派的意愿倒转的。林彪之

流搬出《辨奸论》来，并没能使他的反革命政变免遭破产。早在林彪那篇黑讲话出笼之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林彪这个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还来不及实现建立法西斯王朝的迷梦，就落了个折戟沉沙、粉身碎骨的可耻的下场。

一场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勇前进！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报》1974年第2期）

尊儒反法的《辨奸论》

廖 钟 闻

大约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期，邵伯温（1057—1134）假借与王安石（1021—1086）同时的苏洵（1009—1066）的名义，伪造了一篇《辨奸论》。这是一篇恶劣的尊儒反法的文章。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把《辨奸论》作为理论根据，奉为至宝，为他玩弄阴谋诡计，搞反革命政变服务。剖析《辨奸论》的实质，有助于了解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是怎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有助于进一步批判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

《辨奸论》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自称：“辨奸一篇，为荆公（王安石）发也。”（《邵氏闻见录》十二卷）这是一句真话。苏洵在王安石初次当副宰相、实行变法之前三年就死了。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对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无耻的造谣和诬蔑，并且冒充是

苏洵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写的，是苏洵“预见”到王安石如果受重用，“天下将被其祸”。这种造谣的手段多么卑劣！《辨奸论》的出笼，反映了宋代社会阶级斗争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路线斗争中的一股逆流。

十一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步向后期过渡，正在一步步走下坡路。北宋赵家封建王朝由一小撮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把持最高权力，对侵略者采取忍辱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内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疯狂地镇压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并使许多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破产。财政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矛盾加剧。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的革新的政治路线与以司马光（1019—1086）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守旧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这是要求变革和反对变革、进步和守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的长期斗争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形势下的继续。

王安石吸取了法家的思想，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当副宰相后，改变旧法，实行新法，力图改变北宋王朝日益衰弱的局面。新法推行后，对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的横暴行为有所抑制，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几年间，国家财政由亏损转为盈余，抗御外侮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新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百般抵制和疯狂破坏。

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赵顼〔音序〕死后，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被垂帘听政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头子太皇太

后高氏起用。他一上台，立即进行反攻倒算，贬谪革新派，起用顽固派，尽废新法，恢复旧法。由此，“政日以堕，民日以困”。不久，王安石、司马光都死了，后来高氏也死了，但革新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司马光一伙的投降主义路线，招来了北方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者不断南侵。到了宋徽宗赵佶〔音吉〕、宋钦宗赵桓的时候，赵家朝廷的统治更加腐朽反动，一面向北方的侵略者一再屈辱求和，一面调集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一一二七年，金兵打进北宋首都汴梁，赵佶、赵桓作了俘虏，北宋灭亡了。

邵伯温是北宋道学家邵雍之子。邵家父子都是尊孔派，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邵雍是司马光顽固派政治集团的狗头军师。他披着“隐者”的外衣，干着反对新法的勾当。此人写诗咒骂秦始皇，说什么“坑血未干高祖至，骊山丘垄已萧然”。他还攻击商鞅变法是“贼义残仁，为法自弊”（《伊川击壤集》十三卷）。这分明是借古讽今，发泄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仇恨。

邵伯温继承了他父亲的反动衣钵，成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围攻王安石新法的鹰犬。在北宋的时候，他刚刚当了官，便以罢新法、复旧法为己任。宋徽宗时期，他给皇帝上奏章，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翻案，提出“复祖宗制度”，“分君子小人”（按：指司马光等顽固派为“君子”，指王安石等革新派为“小人”）的反动纲领（见《宋史·邵伯温传》）。这就成为他后来伪造《辨奸论》的指导思想。

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变革，在革新派和顽固派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争辩。南宋初期，再次